

中央宣传部、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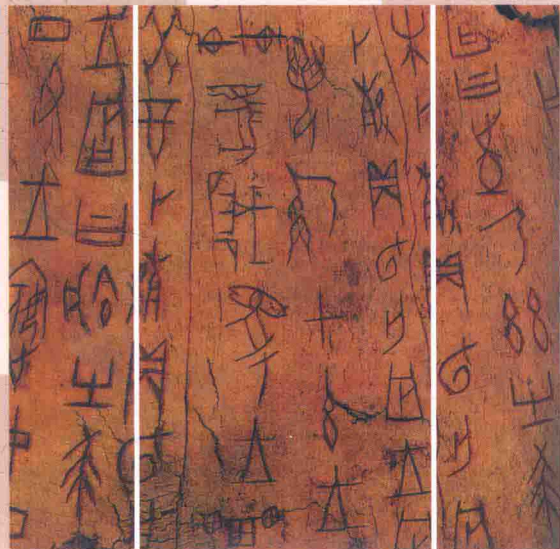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华文化元素 汉字

ZHONGHUA WENHUA YUANSU HANZI

冯天瑜 姚伟钧 主编

王立军 吴菲菲 著



長 春 出 版 社

国家一级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中华文化元素

ZHONGHUA WENHUA YUANSE

冯天瑜 姚伟钧 主编

汉 字

HANZI

王立军 吴菲菲 著

長 春 出 版 社

国 家 一 级 出 版 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汉字 / 王立军, 吴菲菲著. — 长春: 长春出版社,
2016. 12

(中华文化元素丛书 / 冯天瑜, 姚伟钧主编)

ISBN 978-7-5445-4686-7

I. ①汉… II. ①王… ②吴… III. ①汉字—文化—
中国 IV. ①H1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82211 号

汉 字

著 者: 王立军 吴菲菲

责任编辑: 吴 尧 胡 新

封面设计: 王国擎

出 版: 长春出版社

总编室电话: 0431-88563443

地 址: 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

发行部电话: 0431-88561180

邮 编: 130061

网 址: <http://www.cccbs.net>

制 版: 长春出版社美术设计制作中心

印 刷: 吉广控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: 141 千字

印 张: 16

版 次: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58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联系印厂调换 印厂电话: 0431-81067999

总 序

由别具慧眼的长春出版社策划的本丛书，以蕴含中华文化元素的诸事象为描述对象，试图彰显中华文化的特质、流变和前行方向。

“元”意谓本源、本根，“素”意谓未被分割的基本质素，合为二字词“元素”，原为化学术语，本义是具有相同核电荷数（即相同质子数）的同一类原子的总称，如非金属元素氧（O）、金属元素铁（Fe），是组成具体自然物——氧化铁（ Fe_2O_3 ）的基本质素。

作为化学术语的汉字词“元素”，由日本江户时代的兰学家宇田川榕庵（1798—1845）在所著《植学启原》（1834）和所译《舍密开宗》（1837）



中创制，是对荷兰语 grondstof 的意译。清末来华的美国长老派传教士丁韪良（1827—1916）在《格物入门》（1868）中创汉字词“原质”，意译同一西洋术语（英文为 element）。清末民初，汉字词“元素”自日本传入中国，逐渐取代“原质”。1915年，中国科学社董事会会长任鸿隽（1886—1961）在《科学》杂志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《化学元素命名说》，为中国较早使用“元素”一词的案例。^①

在现代语用实践中，“元素”这一自然科学术语被广为借用，泛指构成事物的基元，这些基元及其组合方式决定事物的属性。“文化元素”指历史上形成并演化着的诸文化事象中蕴藏的富于特色、决定文化性质的构成要素。

本丛书论涉的“中华文化元素”，约指中华民族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（包括在与外域文化的交融中）铸造的具有中国气派、中国风格、中国韵味的基本质素，诸如阴阳和谐、五行相生相克、家国天下情怀、民本思想、忧患意识、经验理性导引下的理论与技术、儒释道三教共弘的非排他性信仰系统、区别于拼音文字的形义文字及其汉字文化，等等。它们生长发育于中华民族生活方式、思维方式的运行之间，蕴藏于器物文化、制度文化、行为文化（风俗习惯）和观念文化的

① 见初期，见陈国：《中国
化学史》（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
1935年）；《科学》杂志（1915年）
第1卷第2号。

纷繁具象之中，并为海内外华人所认同。

二

文化的各个不同级次、不同门类包含着各具个性的中华元素。如水墨画的书画同源、墨分五色，武术的技艺合一、刚柔相济、讲究武德，园林的天然雅趣和“可居可游可赏”追求，民间风俗文化涵泳的吉祥、灵动、热烈、圆满，建筑中使用“中国红”（体现生命张力）、中轴线、对称与不对称美感，等等。

汉字及汉字文化是中华元素的一个案例。

世界各种文字都是从象形文字进化而来，多数文字从象形走向拼音，而汉字则从象形走向表意与表音相结合的“意音文字”，近有学者将汉字归为“拼义文字”，即注重语义拼合的文字：首先创造多个视觉符号作为表达万象世界的基本概念，然后将这些符号组合起来，用小的意义单位拼合成大的意义单位，表达新事物、新概念。^①

自成一格的汉字创发于中国，是世界上仅存的生命力盎然的古文字，它主要传播于东亚，成为东亚诸国间物质文化、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互动的语文载体。在古代，中国长期是朝鲜、

① 张其成：《汉字拼义理论：心理学对汉字本质的新认识》，《东南师范大学学报》（社会科学版）2011年第4期。



日本等东亚国家的文化供给源地；至近代，日本以汉字译介西方文化，成效卓异，日制汉字词中国多有引入。汉字在汉字文化圈诸国所起的作用，相当于拉丁文在欧洲诸国所起的作用，故有学者将汉字称为“东亚的拉丁文”。汉字是中华文化系统中影响最为深远广大的文化符号。

20 世纪初，日本学者内藤湖南（1866—1934）提出“中国文化圈”概念，指以中国为文化源及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亚地区，日本是“中国文化圈的一员”，他在《中国上古史》中说：“所谓的东洋史，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”，是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在东亚地区传播的历史。^①此论阐发了汉字这一中华元素在东亚文化圈的重要意义。

中国人在 20 世纪 30 年代即对日本学者提出的东洋文化史观做出回应，傅斯年（1896—1950）在 1933 年著《夷夏东西说》，概括东亚文化的特别成分：

汉字、儒教、教育制度、律令制、佛教、技术。^②

这是中国学者对东亚文化圈的要素即“中华元素”做出的提取。

承袭内藤说，日本的中国史学家西嶋定生

①【日】内藤湖南：《中国上古史》，《内藤湖南全集》卷十，东京：筑摩书房，1997 年。
②傅斯年：《夷夏东西说》，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外编第一册，1933 年。

(1919—1988)在二战后所著《东亚世界与册封体制——6—8世纪的东亚》中指出,东亚世界存在一个以中国为册封中心,周边诸国(日本、朝鲜)为册封对象的“册封体制”,从而提出东亚地区的一种“文化圈”模型。西嶋定生在《东亚世界的形成》中概括汉字文化圈的诸要素(或称“中华元素”):

一、汉字文化,二、儒教,三、律令制,四、佛教等四项。其中,汉字文化是中国创造的文字,但汉字不只使用于中国,也传到与其语言有别又还不知使用文字的邻近诸民族……而其他三项,即儒教、律令制、佛教,也都以汉字作为媒介,在这个世界里扩大起来。^①

1985年,法国汉学家汪德迈在《新汉文化圈》一书中论述“汉文化圈”的特点:

它不同于印度教、伊斯兰教各国,内聚力来自宗教的力量;它又不同于拉丁语系或盎格鲁—撒克逊语系各国,由共同的母语派生出各国的民族语言,这一区域的共同文化根基源自萌生于中国而通用于四邻的汉字。^②

1 [日]西嶋定生:《东亚世界的形成》,参见刘俊安主编,高明士等译:《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》第二卷,中华书局1993年,第488页。

2 [法]汪德迈:《新汉文化圈》,陈怀译,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,第1页。



这里着重表述“中华元素”之一种——汉字的功能，汉字深刻影响东亚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，使汉字文化圈成为一个有着强劲生命活力的文化存在。

三

“中华元素”并非凝固不变、自我封闭的系统，它具有历史承袭性、稳定性，因而是经典的；具有随时推衍的变异性、革命性，因而又是时代的，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表演突显四大发明，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采用中国红，皆为古老的中华元素的现代展现；中华元素是在世界视野观照下、在与外域元素（如英国元素、印度元素、日本元素、印第安元素）相比较中得以昭显的，故是民族的也是国际的，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。美国好莱坞动画片《功夫熊猫》《花木兰》演绎中华元素并获得成功，便是一个例证。

文化元素并非游离于文化事象之外的神秘存在，它们从来都与民族、民俗、民间的文化实践相共生，始终附丽并体现于器物、制度、风俗诸方面的具体文化事象和文化符号之中。中华元

素之于文化事象，如魂之附体，影之随形，须臾不可分离。从诸文化事象（如江南园林、八大菜系、春节中秋等节庆、书画篆刻、昆曲京剧、武当少林功夫）的生动展现中提取中华元素的魂魄，昭显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符号（如深蕴和谐精义的太极八卦图，代表四方、四季的“四灵”——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，代表中央的麒麟）包蕴的精义，是本丛书的使命。

本丛书由阐发体现中华元素的若干文化事象（如园林、饮食、节庆、书画、宫殿、戏曲、服饰、汉字、武术、钱币、宗族、书院、姓名、茶等）的系列作品组成。

中华元素是构建当代中国文化及其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成分之一，是塑造国家形象、提升国民精神的重要资源。开掘并弘扬中华元素，有助于加深中国文化对国人的感召力、亲和力，增强历史敬畏感和时代使命感，提升民族自信心和文化遗产创新的自觉性。

抉发中华元素还有一层意义：通过蕴藏中华元素的文化事象、文化符号，彰显可亲可敬的中国风格，奉献给异域受众，增进国际传播，推动中国文化“走出去”。

本丛书的选题及其撰写沿着“即器即道”的文化史路数，避免一味虚玄论道，也不停留于文

化现象的就事论事，而追求道器结合——于形下之器透现形上之道，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，使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娓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。

冯天瑜

2016年10月

于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

前 言

如果列出中华文化的几个最重要的元素，那汉字一定是不可或缺的。汉字从它产生的那一刻起，就担负起承载中华文化的重任，几千年来与中华文化相伴而行，尽管饱经沧桑，却能同舟共济，共同谱写了中华文明的不朽篇章。

汉字是世界几大古老文字中唯一毫不间断一直沿用至今的文字，这本身就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。从汉字体系的形成发展到现在，已经有大约四千年的历史。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汉语的发展，作为记录汉语的文字符号系统，汉字从字符的构形到书写体势，都发生过几次重大的变化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字体风格。这种变化的深层原因，不只是汉字自身发展规律的作用，还是汉字这种文化元素与其他文化元素互动的结果。



中国最早成体系的文字甲骨文的形成，就源于当时特殊的社会文化——占卜。甲骨文的内容绝大部分是关于占卜的记录，这些记录是刻写在当时的占卜材料龟甲、兽骨上的。在龟甲、兽骨这样坚硬的质地上刻字，其难度可想而知。即使十分用力，也只能刻出纤细的笔道；本来该曲线的地方，也只能刻成生硬的折笔；遇到圆形的东西，也只好刻成个方形。这样，便形成了甲骨文“笔画瘦削、多有方折、刀笔味浓”的字体风格。其实，甲骨文并不是当时的日用字体，而只是占卜这一特殊文化领域的产物。在当时，毛笔已经成了主要的书写工具，只是由于竹筒易于腐烂，我们今天才没能看到，而当时用毛笔所写的竹简文，一定不会具有甲骨文“瘦削方折”的特点。因此说，甲骨并不是当时的普通书写材料，而主要是为占卜这种特殊目的而选用的特殊材料。如果没有当时用龟甲、兽骨占卜的文化活动，甲骨文这种字体就不可能产生。

金文字体的形成和发展，也与特定的社会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。作为汉字字体演变的一个特定阶段，金文是指商周时期继甲骨文之后运用于青铜器上的一种字体类型。青铜器早在商代以前就出现了，当时主要是一些日用器具，其上也没有铭文。商代前期，个别青铜器上开始出现族徽性的单字。商代后期，随着奴隶主宗法礼制的逐

渐强化，一些经常用于祭祀宴享的青铜器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，具有了明贵贱、别尊卑的特殊功能。家族成员立了战功，受了封赐，也要铸刻在青铜器上，以便昭示后人，使子孙后代永志不忘，世代为荣。由于金文是在这样特殊的场合，为着特殊的目的而使用，承载着祖宗的光辉荣耀和对子孙后代的美好愿景，肩负着敬宗收族的神圣职责，这就使得金文具有了“圆浑丰润、庄重典雅、精致美观”的字体风格。这种风格的形成，当然与金文的实现过程有关，因为金文大多是铸造出来的，在铸造的砂模上写字要比在龟甲、兽骨上刻字容易得多，可以对字形进行精心加工，以求得字形上的庄重美观。但是，实现过程的便利，只是为金文的这种字体风格提供了实现的可能性，而真正促使这种风格最终成为现实的，则是宗法礼制对青铜器铭文所提出的文化诉求。只有典雅庄重的字体风格，才能与宗法文化庄严肃穆的氛围相和谐，才能真正承载起宗族的尊严，显示出凝聚宗族的力量。从这种意义上来讲，金文同样也不是当时日常使用的字体，而是青铜文化这一特殊领域的特殊产物。

西周之后，经过春秋时期的动荡，到战国时期已经形成了诸侯割据的局面。正如许慎在《说文解字·叙》中所说的那样，当时“诸侯力政，不统于王，恶礼乐之害己，而皆去其典籍”。对

典籍的轻视，使得人们做事没了共同的依据，写字没了共同的标准，这样，便出现了“田畴异亩，车涂异轨，律令异法，衣冠异制，言语异声，文字异形”的局面。当时各诸侯国文字之间的差异非常大，而且在地域分布上具有一定的规律性：距周王朝所在地越远，变化就越大。盘庚东迁之后，秦迁都于雍（今陕西省凤翔县附近），这里原是西周故地。秦迁来后，基本上继承了西周文化，在文字上也与西周金文一脉相承。当时的秦国相对比较落后，政治经济上都较为保守，文字方面也没有太大的改变，除了书写风格上渐趋规整匀称之外，结构上的变化并不明显。而六国文字则变化剧烈，与西周金文差距越来越大。所以，人们往往把战国文字分作两大派系，即：秦系文字和六国文字。秦系文字在风格上端庄严谨，大小一致，笔形布局极有法度，偏旁部首的写法和位置也都基本定型；笔道粗细均匀，已基本实现线条化；整体风貌已与小篆十分近似，明显处于西周晚期金文向小篆的过渡阶段。如果仅从汉字发展的自身规律去分析，从西周金文，经过战国秦系文字的过渡，从而发展为秦朝标准的小篆，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但是，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种历史的可能性，如果秦国一直是一个弱小的国家，如果不是秦国统一了天下，那么，汉字在金文之后的代表性字体还依然是小篆么？小篆

最终能够成为一种代表性字体，是汉字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？还是依靠政治文化的力量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呢？是汉字的超方言性成就了汉字的强大生命力，使之成为维护中华民族统一的一个重要工具？还是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统治为汉字的生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，使之可以长期承担传承中华文化的重任？这也许是一个永远无法剥离清楚的问题。但汉字这种文化元素与其他文化元素之间存在互动关系，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。

而且，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，除了记录汉语的功能之外，其形体本身还能传递出丰富的古代文化信息。早期汉字的构形往往是对古人生活场景或观念认识的描绘，这样，汉字构形便与古代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极为密切的关系，从而使后人从文化的角度解读汉字成为可能。再加上汉字自古至今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独特的表意性，始终没有割断同文化的联系，这使得汉字构形的文化解读对各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定的适用性。例如“彩虹”的“虹”字的义符是虫，在今天看来，彩虹和虫子根本扯不上什么关系，古人造字时为什么会将二者联系起来呢？原来，在古人眼中，“虹”是有生命的，它长着两个脑袋，会吸溪流山涧中的水。甲骨文中的“虹”字本来就是画的长着两个脑袋的动物低头饮水的样子，是个象形字，后来才改成了以“虫”为义符、“工”为声符的形声字。



关于虹有两首、能够吸水的说法，文献中多有记载。例如，商代甲骨卜辞：“亦有出虹自北，饮于河。”《山海经》：“虹虹在其北，各有两首。”连宋代科学家沈括也非常相信这种说法，他在《梦溪笔谈》中说：“世传虹能入溪涧饮水，信然。”直到现在，人们还用“虹吸”一词表示一种特殊的引水方法，即用一根弯曲的管将水从一个容器吸到另一个容器中，其形象很像甲骨文的样子。古人不但认为虹有生命，而且还认为它有性别，笼统地说都叫虹，细分的话，雄的叫虹，雌的叫蜺。再后来，“蜺”字的义符换成了“雨”，写作“霓”，而“虹”字的义符则一直没有改变。“蜺”字的早期形体及其后来的演变，就是古人对虹的认识的直接反映，这些认识是在早期社会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。汉字构形的这种文化功能，更加深了汉字这种文化元素与其他文化元素的密切关系。

中国一直是一个崇尚文字的国度。早在东汉时期，许慎就在《说文解字·叙》里做出了“文字者，经艺之本，王政之始，前人所以垂后，后人所以识古”的著名论断。文字是一切经典文献赖以存在的基础，是王道政治得以实施的首要凭借，是前人将知识和智慧传给后人，后人了解和学习古人的最重要的工具。有了文字，人类的文明才可能有效地传承，知识才可能逐层地累积，社会